■ 齐鲁名士

在青州市将军山东南1000米处的扈家庙村东头，原有一座御葬大墓，这里埋葬的是明朝抗倭名将邢玠。

将军山下埋忠骨

□ 本报记者 卞文超
本报通讯员 孙方凯

在青州市将军山东南1000米处的扈家庙村东头，原有一座御葬大墓。据村里老人描述，这座大墓陵园占地200多亩，墓道两侧立有石人、石兽。青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其典曾编修《青州市志》，他介绍，这里埋葬的是明朝抗倭名将邢玠。2012年，恰是邢玠逝世400周年。

英雄已逝，当年御葬如今无迹可寻。唯有史册记述了邢玠生前荣耀。万历二十七年(公元1599年)，四月二十五日，明朝廷在北京午门外举行盛大的献俘仪式。七年援朝抗倭，邢玠率明军凯旋，这是倾国大事，百官云集，场面壮观。十年不临朝的明神宗，也圣驾亲临，接受百官朝贺。邢玠加封太子太保。

◀邢玠夫妇画像

◀位于青州市将军山附近的邢玠雕像

◀为纪念邢玠而建的将军亭

出身寒门 道义传家

邢玠，字搢伯，别号崑田，官至兵部尚书。接受记者采访的邢其典是邢氏家族后人，他的家中珍藏着当年邢玠主修的家谱。

明嘉靖十九年(公元1540年)，邢玠出生于青州一户普通人家。“所居近山，比屋悬釜”，仅有“瘠田数亩”。虽然家境清贫，但邢玠父母却是德高义重之人。

邢玠之父名邢镔，生性侠义，平时喜欢议论纲常名节，嫉恶如仇。他看到丑恶之人、丑恶之事，“辄赭颧颊，涌气面”，必当面痛斥并使之收敛才罢休。他仗义疏财，喜欢接济人，毫不在乎钱财。虽然读书不多，但喜欢与读书人来往。由于他的品行，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。曾有一伙强盗骚扰乡里，邢镔单枪匹马来到强盗寨中挑战，以计谋吓退盗贼。

邢镔37岁时，意外染疾身亡。他临终前说：“做人处世，惟有与人为善最为重要；与人交往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不可让别人吃亏。”邢玠对父亲的遗言，“泣而书之”。

父亲去世后，“诸强宗悍邻，侧目虎视”，一些轻狎豪暴子弟，也时常欺凌孤儿寡母，但邢玠母亲郑氏不与他们计较。尽管家境贫寒，但照样接济遇到困难的亲戚。邢玠父母合葬《墓志铭》现藏于青州博物馆，其上记载，一个叫赵忠的穷人因缴不起赋税被迫卖女儿卖妻子，邢玠母亲不忍看其惨状，用自己仅有的储蓄钱为之补缴赋税，赎回妻女。

家中贫穷，母亲摘下耳环、头簪为儿子请老师。邢玠在父母的熏陶下，晨耕暮读，读书非常刻苦，加之天资聪颖，在府学读书期间成绩卓越。

隆庆元年(公元1567年)，山东乡试在济南举行，青州邢玠中举人。隆庆五年(公元1571年)，邢玠考中进士，授密云县知县。临行，母亲嘱咐儿子四个字：“缓刑宽税”。

平土司之乱 兵不血刃

在今将军山南侧，有一座将军亭，是后人为纪念邢玠而修建。亭上题写对联：晨耕暮读太淑女红铸名令，西抚东征柱国戍边望藩邦。寥寥数字，记述了邢玠从家教成长，到转战边陲的人生轨迹。

邢玠进入仕途后，先后任密云知县、甘肃巡抚、山西右布政使、大同巡抚、南京兵部右侍郎总督川贵军务等职。这些职务多在边陲，既管民，又统军，需要文武全才。西抚东征，邢玠文武兼备，很好地履行了职责。

明中后期，边事纷起。万历二十二年(公元1594年)，朝廷任命邢玠为川贵总督，率军平叛土司之乱。邢玠至蜀后，并没有仓促进剿，而是全面分析叛乱发生的原因。这场由土司内部矛盾引发的叛乱，邢玠“以剿促勘”、“阳剿阴抚”，并采取“震以雷霆之威，谕以丹青之信”的措施。

他首先陈重兵于阵前，造成大兵压境的强大威慑力，使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意识到“待剿即祸重”。随后邢玠开以大信，“龙来当待以不死，否者国家悬万金购尔头。若早为计，吾不而欺也。”这样，邢玠恩威并举、兵不血刃地平定了这场长达三年的叛乱，使朝野上下刮目相看。

平倭挽狂澜 有死无二

明朝初期，日本国失意的武士、浪人组成海盗队伍，经常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，史称“倭寇”。明朝对倭寇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斗争。

到16世纪末期，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，为转移国内矛盾，制定了占领朝鲜、征服中国的对外扩张军事侵略计划。明政府为确保自身安全，开始援朝抗倭战争。在《邢玠生平纪略》一书序言中，记述了邢阶在这场战争中立下的卓越功勋。

万历二十五年(公元1597年)二月，明朝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总督蓟、辽、保定军务兼粮道经略，全面负责援朝战争。

邢玠上任之初，内外形势严峻。由于此前中日和谈，明政府将大批部队调回国内休整，日军突然发动袭击，令明政府猝不及防，节节败退。面对复杂的形势，邢玠作为东征主帅，指挥镇定自若，在朝廷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

“公既至军中，标剑登坛乃誓曰，必破倭，有死无二。”邢玠一到朝鲜，就目标明确地表明自己坚决的立场，鼓舞士气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。

邢玠迅速稳定了朝鲜战场的形势。他积极筹备兵力、增备水军、加强防御、完善后勤。他高居战略指挥中枢，善用兵法，统筹谋略，巧寻战机，体现了高度的指挥水准。更为难得是，邢玠积极地穿针引线，在皇帝、政府、将领、朝鲜各方之间，建立了互相信任协作的关系，结成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，达到了高度的军权统一。

邢玠统军奋战一年，扭转了战争被动局面。万历二十六年(公元1598年)十一月，明军誓师汉城，组织反攻。日军见大势已去，加藤清正率先逃跑。中朝联军在南海展开阻截。十一月十九日凌晨，战斗在露梁一带海面打响。中朝将士勇往直前，击沉日军战舰五百余艘，日军大败，水军覆没，浮尸上万。露梁大捷，结束了历时七年的日本侵略战争。

朝鲜建生祠 积劳之重臣

“东海静波，藩邦再造！”朝鲜国王李昖回到汉城王宫，感激涕零。

为了纪念抗倭战争的胜利，在汉城建大报坛以志不忘。国王李昖求得经略邢玠画像，在王京太平馆以西，为邢玠建立生祠。国王亲书“再造藩邦”四字谒之。

邢玠从汉城一路归来，看到朝鲜经历七年战乱，满目疮痍，百业凋敝。他上疏建议，将义州等仓所遗军粮米豆12万石，留于朝鲜，以赈民生。万历皇帝同意了上述建议。

万历二十七年(公元1599年)四月二十五日，邢玠凯旋，万历皇帝以盛大仪式接见归国将领。邢玠率领四位总兵叩拜、献俘。闰四月初八，皇帝为东征胜利，向全国颁发诏书，通告平倭的缘由和经过，并宣示“诸凡东征加派钱粮，一切尽令所司除豁”。

邢玠长期戍边，鞍马劳顿，六十岁过后仍披坚执锐。征尘未洗，又受命镇守辽东。万历二十九年(公元1601年)二月初三，皇帝命邢玠以太子太保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

虑及八十岁老母孀居在堂，邢玠屡次请求归养侍母，皇帝不允许。直至万历三十九年(公元1611年)，万历皇帝下诏：“南京兵部尚书邢玠应准休致，以全晚节。”

万历四十年(公元1612年)二月十五日，邢玠73岁，殁于家。临终遗疏数千言，涉及破党、用人、发帑、罢税。次年，万历皇帝下诏，赐邢玠少保兼太子太保，南京兵部尚书邢玠祭葬如例。邢玠“历任四十年，强半在边方。益所谓积劳之臣也。播事则议抚，东事则议战，虽功效不同，而其谋略为世所重云。”

·相关链接·

邢玠戚继光 共修古北口长城

□ 卞文超 整理

戚继光和邢玠同为明朝抗倭名将，两人都来自山东。据邢其典编著的《邢玠生平纪略》中记述，邢玠任密云县令时，曾和镇守北部边关的戚继光，共同修缮古北口长城。

明建国以后，为了防御元朝后裔蒙古部落的侵犯，从洪武初年在大将徐达的率领下，开始修建明长城，也就是现在的万里长城。在密云县境内，明长城沿县东、北、西三面边界，盘旋起伏，穿越54个村庄，县内全长600多华里。这一段长城的今貌，有戚继光和邢玠通力合作留下的历史印记。

戚继光，山东登州卫人。他出生于军事家庭，17岁承袭父职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，负责海防。嘉靖三十一年，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，次年夏晋升山东都指挥佥事。后兵部调其北上，轮训蓟州、昌平、保定三镇边军。

戚继光在治军御敌中，主张跨墙修筑敌台。原北京一带长城，历经百年，有所损坏。戚继光认为，绵延两千里的边防，只要一处有缺口，就危机四伏。他提议：跨墙修建空心台，叫做敌台。高五丈，中分上下三层，上有雉堞，内可宿百人。里面铠甲、器械、粮草俱全，士兵居内，既可守望，也可迅速集结作战。隆庆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隆庆五年(1571年)夏，邢玠出任密云县令，时年31岁。密云县是北京至东北各省的重要通道，有北京的东北大门之称，自古设重兵把守。北方游牧民族也从这几条道路入关。明朝修长城，设关隘也均在于此。受战乱影响，此地商业萧条，居民企盼平安岁月。邢玠上任后，宽税、缓刑、开漕运。

当时戚继光任蓟州总兵，正修筑长城，巩固北部边防。邢玠作为密云新任县令，专程拜访戚继光。戚继光在古北口早早等候。从司马台、古北口到白马关，这一段长城最为险要，也是军事防守的重要位置。戚继光往来于此，长住古北口营城，督查工程进度。

戚继光对邢玠的到来非常期待。当时修长城人员缺乏，工程进展缓慢，县令的到来，令他看到希望。邢玠对这位抗倭名将仰慕已久，把助修长城的具体安排向总兵作了禀告。戚继光为人豪爽，以工代赈，体谅百姓贫苦。两人视察了重修的铁马关和司马台。登高远望，长城尽收眼底。

邢玠古北口之行后，全县支持边墙建设，工程进度快质量好。戚继光满意，时任蓟辽总督、工程全线指挥的刘应节也非常满意。工程结束后，负责工程监督的御史上报朝廷，隆庆皇帝大喜，下旨嘉奖。

宋教仁遇刺真相

1913年3月20日夜晚，沪宁火车站和往常一样人流如织，川流不息。火车拉响了启程的汽笛，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、于右任和廖仲恺挥手作别，走进了检票处。就在这时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检票处骤然响起三声枪响，宋教仁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车站上顿时秩序大乱，旅客四处逃散，刺客乃乘机逃逸，无影无踪。

宋教仁，字遁初，号渔父，湖南桃源人，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，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《民立报》主笔。辛亥革命后，参与筹建临时政府，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，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。

□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一传开，便在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。各大报纸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竞相报道了这一令人痛心而意外的消息。袁世凯颁布命令说：“前农林部长宋教仁，奔走国事，缔造共和，阙功甚伟。凡我国民，同深怆恻。”

在群众和舆论的逼迫下，袁世凯电报江苏都督程德全：“立悬重赏，限期破获，按法重办。”

正当案件的调查工作在忙乱中进行的时候，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，惹得当时人心惶惶。当然，报纸上的言论也并非空穴来风。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，宋教仁就因为政府的体制原因与孙中山有过争论。

孙中山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之时，宋教仁就向孙中山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，即由宋教仁出任总理，实际掌管内政外交，而孙中山的总统则做形式上的国家元首。孙中山表示反对。就当时的情况而言，孙中山主张的总统制还是更为符合时局。

国民党组建后不久，孙中山就不太过问党务，本着为国为民多做些实事的心态，四处考察铁路。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，孙中山仍滞留在日本。

江苏都督程德全、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，全力协拿凶手，限期破案。黄兴与陈其美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，悬赏万元，缉拿凶犯，可是却始终找不到有力的线索。

3月23日，英租界的巡捕房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人，巡捕认出了他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古董商。这位古董商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正是他的一番供词，才使得刺宋案渐渐走向了明朗。当时，他对巡捕这样说道：“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夔丞的家里兜卖古董，他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，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为报酬。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，从没杀过人，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。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，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，正是应夔丞叫我去暗杀的人。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夔丞，便可找到凶手。”

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、帮会头子，也曾是革命党中的一员，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。回到上海后，重操旧业，改组青红帮为“国民共进会”。

湖北路迎春坊228号，一位女子正替坐在茶几边的男人上茶。突然，大门被踢开，门外出现的是租界的巡捕。女子大惊失色，男子见状，正欲翻窗逃跑，就被巡捕按到墙上，戴上了手铐。这个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应夔丞。

应夔丞并非刺宋案的动手之人。根据应夔丞提供的线索，巡捕又来到文元坊搜查。一名巡捕突然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在向文元坊靠近。这人一只脚刚刚踏进文元坊，即被突然现身的巡捕逮了个正着。男子一脸的意外，而逮捕他的巡捕更是满脸的震惊。这个人正是流窜上海的亡命之徒——武士英。

武士英被捕后供认说，应夔丞答应给他1000元，拿出宋教仁的照片，让他行刺。而直到行刺得手，武士英仍不知道宋教仁究竟是什么人。

□当时人们的疑问是，应夔丞为什么要买凶杀害宋教仁呢？这要从宋教仁所处的历史环境说起。

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，清廷便成了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。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，让洋人痛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，他们瞄上了袁世凯。原因很简单，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差别在于，前者是阴谋家，而后者是理想家。

但当时孙中山对于袁世凯，却并不是完全的信任。这一次，孙中山站在了宋教仁这一边。孙中山虽然让位给了袁世凯，但却在让位之前通过了《临时约法》，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，希望借用法律的形式来限制袁世凯将来可能的独裁。

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。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、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。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，并无实际权力。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，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。

对于一心想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，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。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，废除责任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。

国民党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，国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，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，削弱袁世凯的权力。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，宋教仁沿江东下，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，批评袁世凯政府，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，为建立责任内阁，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。言论风采，倾动一时。

袁世凯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，便派人给宋教仁送去西装和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，请他自由支用，但宋教仁在离京南下前夕，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，并留信一封表示谢意：“绨袍之赠，感铭肺腑。长者之赐，仁何敢辞。但惠赠五十万元，实不敢受。”此后，宋教仁一如既往地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，表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。

□1913年3月20日，宋教仁准备从上海起程回北京，送行的有黄兴、廖仲恺、于右任等人。当晚10时许，火车进站。宋教仁几人边说边行，走到了检票处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一阵枪声，只见宋教仁以手抵腹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宋教仁

赵秉钧

宋教仁被迅速送至铁路医院，但终不治身亡。

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，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刻，于是人们对案件的背景和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，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
1913年3月25日下午，法捕房的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的宅邸进行第二次搜查。搜得多件公文凭据，并发现了贴有封条的皮箱一只，以及五响手枪一把。巡捕房将案发当日从车站拾到的两枚弹壳，与枪内所存子弹进行比对，两者均为相同型号。

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函文，负责这起案件的程德全不禁大惊失色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刺杀宋教仁的案件背后，居然是这样一个人物。

这个人叫洪述祖。洪述祖人称“洪杀胚”，在当时担任内务部秘书，实际上他是受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子，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。

难道以洪述祖这一区区内务部秘书就敢公然行刺国民党党魁了吗？刺宋案是否还有着更深刻、更隐秘的内幕呢？这天，愁眉不展的程德全正在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几份函电，突然，一个名字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他的名字叫赵秉钧，曾任内务部部长，时任民国内阁总理，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。面对这样一位人物，程德全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说起来赵秉钧与宋教仁还有同款之宜。宋教仁屡次进京，与袁系人马最谈得来的就是这位赵秉钧，甚至宋教仁每次进京，都住在赵秉钧的家里。然而，在权力争夺面前，赵秉钧也不得不痛下杀手了。

正当程德全一筹莫展之时，突然响起了尖锐的电话铃声。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张一麐，是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致电程德全了。致电的原因程德全早已能倒背如流：向巡捕房索取刺宋案中牵涉到中央的证据，并立刻派人送往北京，电话里还不忘特别叮咛一句：可不作正式报告！

但是，在孙中山与黄兴的强烈要求下，程德全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公诸于世。原本就已经暗流汹涌的海面被投掷了无数颗炸弹，新闻界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纷纷猜测，袁世凯与刺宋案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案子自此急转直下，袁世凯被无奈地推到了台前。当时民意滔滔，袁世凯不得已要想出些化解的办法，于是，他暗示京兆尹王治馨，在京举行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为自己开脱。

这个王治馨是个糊涂虫，他在追悼会上说，应夔丞到北京后，曾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。总理也曾向总统请示过，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，所以不予同意。由此可见，宋案与总统和总理无关，完全是应夔丞和洪述祖一手策划的。

王治馨的这番话让人听来有欲盖弥彰之嫌，把袁世凯和赵秉钧气坏了。

□可案件的真相，却随着当事人一个个离奇死亡更加迷雾重重。

武士英被捕入狱之后，于1913年4月24日在狱中暴毙。外界传言，这是应夔丞的党羽为了杀人灭口，把毒药放入馒头送进监狱把他毒死的。

而与此同时，应夔丞还依然被囚狱中。1913年7月，“二次革命”爆发，应夔丞在兵荒马乱之时，纠合狱中囚犯越狱逃跑，躲进了青岛租界。

1913年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。但由于仓促上阵，实力不足，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黄兴迟疑不决，主张法律解决，“二次革命”遭到挫败。

之后，黄兴、孙中山纷纷出逃海外，而袁世凯则在数月之后，当上了自己觊觎已久的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。

袁世凯镇压“二次革命”后，应夔丞认为时机已到，公然发出“请平反冤狱”的通电，并大摇大摆地跑到北京，要求袁世凯实践当初“毁宋酬勋”的诺言。袁世凯如果授予他勋位，那就等于自己承认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，这让袁世凯非常头疼。

应夔丞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1914年1月，袁世凯突然派他去天津。从北京开出的火车上，应夔丞悠闲地张望着冬日的景色。两条人影闪进包厢，包厢内传出一阵惊叫，片刻之后，就恢复了平静……

应夔丞的死讯传出后，天津《大公报》马上登出消息并配上评论，评论中毫无掩饰地指出：“(应)公然发电卖功，旋复大摇大摆款段入都，蛛丝马迹，宋案之底里，因不难揣测而知。”把矛头直指袁世凯，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。

1914年2月27日晨，天津河北区仁寿里赵秉钧的私宅中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。“都督病死了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此时的赵秉钧只有51岁。

刺宋案发生后，袁世凯为掩人耳目，将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。赵秉钧死前一段时间，还曾经多次前往北京晋见袁世凯，对外的报道为研究国体事宜。

在这样的时刻，赵秉钧的死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。赵秉钧的死，使得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的说法缺少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证据。

而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，因袁世凯十分痛恨他在宋教仁追悼会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，于民国3年6月，以他贪污区区500元之罪将其处死。

最后一个轮到的，便是北京方面的直接联络人洪述祖。洪述祖一直暂避青岛，直到袁世凯一命归西，他才敢出来活动。却没想到在上海惹上了诉讼官司，刚刚处理完想离开，就被宋教仁时年15岁的儿子宋振吕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，送至法院，以当年杀人在逃之罪被判处死刑。

(中央电视台10套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供本报专稿)

探索·发现